

中国 农村 研究

CHINA RURAL
STUDIES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中国期刊网 (CNKI) 入选集刊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农村研究. 2011 年. 下卷/徐勇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161-0310-4

I. ①中… II. ①徐… III. ①农村经济社会—研究报告—中国—2011 IV. ①F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7528 号

责任编辑 李尔柔等

责任校对 宗 和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308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中国农村研究》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陆学艺 张厚安

主 编：徐 勇

副 主 编：项继权

执行主编：唐 鸣

执行编辑：刘义强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建嵘	邓大才	王敬尧	王金红
石 挺	刘义强	何包钢	宋亚平
吴理财	李德芳	陆学艺	杨海蛟
项继权	贺东航	党国英	徐 勇
唐 鸣	高秉雄	曹 阳	谢庆奎
景跃进	董江爱	詹成付	Jean Oi

Stig thøgersen

目 录

“南农实验”专辑 基层民主动力再造

在民主实践中提升农民民主能力

——以南农实验为例 马 华(3)

涉农媒体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功能:以南方农村报

参与南农实验为例

——以南农实验为例 毛志勇(15)

强化村民自治过程中的政府引导

——以蕉岭纪委介入南农实验为例 刘龙飞 卢尧生(23)

市场分化与农村治理

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分化及其发展趋势研究

——以中部地区的湖北省为例 刘金海 黄振华(41)

农业保险与农业产业化

——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调研 杨兴洪(66)

农民自主成立的合作社与“支部+合作社”治理绩效的

比较分析

——基于甘肃省民勤县的调查案例 韩国明 郭鹏鹏(82)

执行差距与事权划分的判准原则:农村教育改革的

支出分析 李芝兰 袁方成(98)

欠发达地区乡镇政府建设实践与对策分析

——基于陕南欠发达地区农村乡镇调查实例 ... 张丽娴 李振东(112)

西部农村法治建设的任务、问题与方略 易 军(128)

土地流转与征用

农民土地流出意愿研究

——基于辽宁西部三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张广辉(147)

土地流转中的农民逻辑与乡村发展

——以江苏徐洪村为例 刘义强 胡 军(159)

我国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土地补偿矛盾与制度改革

——以广东西北 K 村为例 刘 军(172)

乡土深描

地方性知识:土楼人家的农业生产与生计

——来自闽南打石洋的田野调查报告 平 锋(183)

从传统到现代:小农的现代性蜕变及其发生逻辑

——以 H 村白菇种植户为个案的实地研究 姜方炳(226)

学术特稿:中国农村研究的政治学价值

农村研究对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贡献

——兼论中国政治学的学术自觉 程同顺 张英秀(249)

新书评

土地制度与历史兴衰的逻辑

——邓大才《土地政治:地主、佃农与国家》有感 樊红敏(265)

王朝更替的土地政治学

——农地流转、交易成本与历史“周期率” 王 勇(269)

“南农实验”专辑 基层民主动力再造

◆在民主实践中提升农民民主能力

“南农实验”是以村民自治为实验场景，以农民自身为实验主体的一场政治发展实验。该实验着重探讨的是如何提高农民的民主能力。其实验的理念可以概括为：在相对于远离城市的乡村地区汇集多方资源，共同进行包括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诸多方面综合建设与发展尝试。从以往的村治实验中我们发现，农民在利益追求能力上的弱势与利益表达渠道、表达能力的缺失是联系在一起的。

◆涉农媒体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功能

新闻媒体通过南农实验介入到村务管理当中是史无前例的，在南农实验之前，还不曾有过文献记载。众所周知的农村社会实验，都是由政府、乡绅或者学者参与和推动的，而媒体总是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为报道者，即站在中立的位置上去观察和报道，通过媒体平台或其他方式，将自己了解到的真相传播出去，以引起社会和决策者的注意。这也可看出我国目前新闻媒体的功能。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新闻媒体包括信息传播、舆论导向、社会监督及文化传承等多项功能。南方农村报在参与实验后，其媒体的作用也在慢慢地发生改变，不再像先前那样更多只是重视新闻理论，而是开发过去传媒不具有的隐形功能，开创了把新闻理论和社会理论两者结合的先河，整个舆论导向都由批评社会转向批评与构建社会相结合转变。

◆强化村民自治过程中的政府引导

在蕉岭“村务监事会”制度的实践中，蕉岭纪委充当了“第三方的监督制度机构”。在诸多国家权力机关中，蕉岭纪委介入村级监督有其现实因素和偶然因素。从现实因素来说，由纪委来推动村级监督，体现了当前村级监督缺乏真正强有力的推动者。蕉岭纪委的介入表明危害基层治理的贪腐行为已经引起了基层纪检部门的高度重视。当前我国村民自治中存

在的制度不完善，村民民主法制观念不强等问题，使村级民主监督的实现仍需要国家权力机关的介入。从偶然因素来说，蕉岭县纪委书记的个人素质和改革精神，以及“村务监事会”在实践中的不断完善等，都是这一制度创新取得成功的关键。

在民主实践中提升农民民主能力^{*}

——以南农实验为例

马华

(许昌学院中原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河南许昌 461000)

内容提要：“农民文化素质低，不会民主！”是我们时常能听到、看到的说法，也是村民自治在实践中的现实遭遇。如何让民主从形式走向实体？在以往的两次村治实验中我们发现，以制度建设、组织建设为内容的外部动员，无法保障基层民主的有效运转，自治主体能力的匮乏是导致前两次民主实验相继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此背景下，才有了一场旨在探索如何提高农民民主能力的村治实验，即“南农实验”，该实验希望通过民主主体自身能力的培养，使得民主规则、民主程序内化为不可逆转的民主习惯，进而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与自身民主素质较低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 南农实验 表达能力 合作能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民主政治在新的体制框架内已经走过了30年。在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这30年中，留下了足够多的经验和教训供研究者去研究。从当前国内的研究情况来看，研究者大都从国家层面关注民主治理的成效，而对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研究，基本都还停留在村民自治制度本身的研究上，对自治主体即农民的民主能力很少有人关注。从村民自治的具体实践情况来看，当下的基层民主实践正遭遇着参与不足的困境，民主选举一马当先，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却相对滞后。因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变迁的政策话语与关键词研究”（项目编号：2009JJD840005）研究成果之一。

马华（1981—），男，河南人，政治学博士，许昌学院特聘教授，中原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乡村治理与基层政治研究。

此，如何在实践中培育、提高广大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能力，这不仅是在学界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能否取得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本文以“南农实验”为例，着重回答的是以制度、组织为基础的外部动员无法使村民自治走向扩大与深入，而且在民主随着利益走的现实条件下，只有当农民学会了利益表达、利益维护，并同时具备了实现利益的能力时，我国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一 南农实验由何而起？

2006年4月12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南方农村报社和4个村（小组）及其所在的地方政府代表，共同签署了《合作共建新农村示范实验点协议》，并举行了启动仪式，徐勇教授将此次实验命名为“共建新农村——南农实验”，意为“农民和政府、学术机构、媒体在南方农村地区共同建设新农村”。在启动仪式上，徐勇教授指明了南农实验的目的：这是一个以人为本，尊重农民权利，由村民充分参与，并且以提高农民福利为目的的社会实验，它把学术资源、媒介资源、政府资源和民间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国内首创。希望通过实践，探索出新农村建设中规律性的东西，寻找多样化的发展模式。^①在本次实验中，农民的民主能力问题是实验的核心，其中农民的表达能力、合作能力是本次实验着重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南农实验由何而来？缘何将本次实验聚焦在农民的“能力”问题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起于着重制度建设的“水月实验”。

从1996年至1998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选取湖北省黄梅县水月庵村展开民主体管理实验，简称“水月实验”。“水月实验”的诞生标志着“中心”此后一系列村治实验由此拉开序幕。之所以选择此时进行村治实验，徐勇教授认为，这与村民自治的成功实践密不可分，村民自治一出现就被人视为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与此同时，它也因其“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而招致理论界的

^① 南方农村报：《“南农实验”昨启动》2006年4月13日。

质疑,不进一步解决理论问题,会影响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①在此背景下,张厚安等老一辈学者于1996年按照村民自治的基本要求,向中共湖北省委提交了在湖北省选择一个村进行“依法建制,以法治村,民主管理”实验的报告。在有关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实验选择在鄂东地区黄梅县水月庵村进行。该实验强调的是制度建设,其目的是通过制度下乡,直接在乡土平台检验村庄治理过程中哪些制度是有效的,哪些制度是需要加强和丰富的,由此来为成长中的村民自治制度添砖加瓦。

能否仅仅依靠“制度”建设来重组不断变化的中国农村?从实验结果来看,实验后的水月庵村确实有了一些新变化,例如,村中的很多事情都要公开,农民知道这些事情之后就更容易理解和支持村委会了;通过换届选举的方式,村民可以选择自己认为好的干部,选对村民的利益好处大的干部。水月实验的制度化探索开启了基层民主建设的第一步,但本次实验只侧重制度建设,忽视了组织建设、能力建设等相关其他民主要素的跟进,结果使得轰轰烈烈的水月实验前后只进行了两年,便宣告结束。透过本次实验我们注意到了村民自治在基层推进的复杂性,比如村民寄予厚望的村民李为什么就职不到200天便辞去职务?比如为什么有些村民刚开始积极参与选举,随后又极力逃避呢?这其中既有复杂的村落利益结构的原因,又有传统治理体制与现代治理架构不适应的问题。从本次实验中我们受到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利益分化导致村民更关注眼前利益,村民虽有参与的意向却缺少参与的行动。针对参与不足的问题,我们需要培养农民正确识别、表达自身利益的能力。

第二,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村落传统结构抑制了现代民主机制的生成和发展,权力制衡与科学监督相对滞后。针对监督滞后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村组法》中的民主监督机制,探索适合农村政治特点的监督机制。

第三,以民主治理为核心要素的现代型治理机制成长缓慢,制度规则只提供了民主的形式却无民主的实质。针对此问题,我们需要深化村级民主,借助民主机制挖掘村庄内资源,从输血式治理转变为造血式治理,在民主实践的过程中把现代民主理念嵌入到乡村内部。

^① 徐勇:《村民自治: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载《人民论坛》2008年第17期。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从制度求民主，只是迈出民主化进程中的一小步，相对于极权主义专制国家的沉重历史，中国农民的民主能力问题，始终是制约基层民主深入发展的瓶颈。从日常表达到体制监督，农民的政治生活处处彰显出参与的无力。水月实验留给未来相关村治实验的重要启示是，以制度整合农村是农村治理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要尝试的是以组织整合农村，以能力整合农村，从民主制度到民主能力是深化民主化治理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必经之路。

其二，起于着重组织建设的“岳东实验”。

2004年10月1日，在安徽省蒙城县岳坊镇岳东村，“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岳东村综合发展试验区（以下简称“岳东实验”）。由此拉开第二次村治实验的序幕。这次实验强调的是以组织建设重新整合农村，希望通过自主、自为的组织化建设，培育农民的参与意识。这种农村社区内的微观组织再造的尝试，必将激发社区内各种潜在力量，从而为村民自治的深化提供各种组织载体。在肯定了农民需要组织，农民必须组织后，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农民需要什么样的组织，农民如何进行组织？中国著名的乡村建设理论家梁漱溟先生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严重的文化失调导致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即将崩溃，当时历史条件下救活农村的唯一办法是进行新社会的组织构造，也就是成立乡村组织。在笔者看来，伴随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民逐渐被卷入到现代社会当中，市场化与理性化成为现代小农的显著标志，弱小、分散的农户不仅制约了其与市场谈判的能力，也增加了民主化治理的难度。当前农村社会迫切需要各种微观组织再造，这种来自农村社会内部的组织体系建设必将架起国家与农村社会联系的桥梁。

能否仅仅依靠“组织”建设来重组当今的农村？从“岳东实验”的结果上看，“岳东实验”只是发展乡村组织的一种尝试。综观整个实验过程，岳东每个实验项目几乎都是轰轰烈烈开始，急急忙忙收场。除养鸡协会、普法协会、乡村图书馆外，我们的实验人员在岳东村还试图建立村庄公益事务理事会、村庄住宅合作社、老人协会等，这些项目尝试初期就被迫终止。岳东实验带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自治主体的民主素质问题是困扰村民自治走向深入的根本问题。由于受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禁锢，传统小农学习起现代民主知识并非易事，将现代民主内化为他们的理念、文化和日常的生活方式，更是存在着诸多困难。能力意识的匮乏使得普通民众很难行使对政府精英的控

制，更无法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上升为可以执行的政府政策。因此，进行任何村治实验都必须首先从重视最基本的能力做起，必须立足于中国农民民主素质低的客观现实。

第二，乡村、家庭、宗族、人情、面子、关系是无法回避的中国特色。在人情、关系面前，法律是位居二位的。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农村法制建设的难度。岳东社区实验的理论来源是西方社会已发展成熟的社区建设理论，但是西学中用需要一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如何建立与中国乡土本色相适应的现代型民主治理体系是一项新的课题，也是建设一个现代型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

第三，现代国家的构建，离不开现代型制度、现代型组织体系以及现代型农民即新型农民。从“岳东实验”中，我们的收获是：农民应当是合作组织的主体；农民是现代合作组织的发起者、参与者。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组织建设，农民的参与能力问题是实验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二 村民自治的实践证明“农民尚缺乏实践民主的能力”

长期以来有关民主的认识存有争议，一种声音是农民民主素质低，农民不会民主；另一种声音是文化素质并非民主的决定因素，即便在受教育程度很低，甚至文盲的农村，农民也有发展民主的需求和实践民主的基本能力。依据前两次实验的启发，笔者认为，民主是源自于西方世界的外来品，近代中国虽然曾萌发过学习民主的思潮，但当时的民主热情只停留在知识分子的阶层，中国农民由于文化素质弱，学习民主相对困难。自全国第一个村委会在“广西宜州市合寨村”诞生后，中国农民有了学习、实践民主的政治舞台。从30年来村民自治实践的过程来看，大多数农民有发展民主的强烈需求，但农民尚缺乏实践民主的能力。有关农民缺乏实践民主能力的判断，我们可以从南农实验的具体实践中找到相应的依据。

民主素质是否影响民主能力？针对此问题，南农实验展开了抽样调查，观察的主要对象有乡镇人大代表、村民代表、普通村民、农民合作组织成员等，调查结果显示：

第一，乡镇人大代表对基本的三农政策、权力救济渠道了解不深，语

言表达能力较差，政策法律学习积极性不高。由此可见，代理人自身代理能力的缺失，造成其无法完成本选区民众赋予的相应职责。

第二，普通村民的表达能力较弱。从调查的结果上看，普通村民的语言表达能力差，宪政常识掌握不好；普通村民对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三农政策了解程度非常低，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较弱；农民表达能力强弱与经济发展程度成正相关，工业化程度越高，经济发展越好，农民识别利益、维护利益的能力就越强。

第三，农民合作组织缺乏自治的能力。一方面，农民普遍存在着合作需求，诸如成立专业经济合作社、土地互换或转包租赁、信息共享、大型农机合作购买等；另一方面，农民对合作知识了解欠缺，不愿意参加有关知识的培训学习，农民合作缺乏带头人、组织者。

第四，农民之间信任半径降低，缺乏合作所需的信用基础。现代农民合作组织建立的前提条件是重构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网络，但现实中的农村，以血缘、地缘结构而形成的传统信任网络在逐渐瓦解，契约信任、合作信任等现代型信任网络尚未形成，农村普遍缺乏对现代社区共同体的认同。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发现，以村民自治为标志的基层民主实践，使得民主开始在中国广大农村土地上扎根。然而，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小农阶级像一堆土豆一样互相不能团结起来，由于其固有的分散性，他们当然没有能力来推进民主。在“南农实验”项目的推进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民的利益诉求被长期压抑，致使其泯灭了对自身深层次权益发掘的愿望，同时也不能掌握表达自身利益的方法和手段。但是，伴随民主化进程的加剧，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农民的民主能力建设日益显得重要。无序的政治参与，一方面不能把村落社区的声音有效传达到当局以争取于己有利的政策；另一方面在官民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则扩大了冲突的强度。因此，研究农民的民主能力，有利于扩大基层民主政治参与的范围、程度；有利于将无序参与转向有序参与。民主化道路的经验告诉我们，基层民主的不断发展过程，亦是公民社会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伴随政治参与的逐步扩大，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农民民主能力提升的可能性有哪些？农民民主能力的提升需要精英阶层的推动、政府的主导还是农民自发的觉醒？

三 南农实验如何提升农民的民主能力

“南农实验”是以村民自治为实验场景，以农民自身为实验主体的一场政治发展实验。该实验着重探讨的是如何提高农民的民主能力。其实验的理念可以概括为：在相对于远离城市的乡村地区汇集多方资源，共同进行包括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诸多方面综合建设与发展尝试。从以往的村治实验中我们发现，农民在利益追求能力上的弱势与利益表达渠道、表达能力的缺失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南农实验”希望通过系统化的训练，一方面提升乡镇人大代表的代理能力，使之能够顺利地收集到选民的意愿和争取到最广泛的支持，同时又能够将选民的意愿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强化村民自治的实施质量，使普通村民从以制度为主体的形式民主，过渡到以能力为主体的实质民主，进而使普通农民识别和表达自身利益的能力得到根本改观。在实验的具体操作中，南农实验采取了逐渐提升的策略，这是因为，农民的民主能力只有在不断的民主实践中才能得到锻炼与提高，具体做法主要有：

其一，能力提升方略第一步：表达能力建设。

利益表达作为政治过程的起点，在民主化治理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依据“南农实验”需求评估调查，四个实验村的村民普遍存在着政策法规掌握程度低，语言文字能力较差，乡镇人大代表参政议政能力较弱，制度化表达渠道不够畅通等问题。针对上述情况，课题组展开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农民表达能力的相关项目，诸如：新型农民培训、乡村书屋工程、义教支农、妇女权益论坛、妇女学习班等。以新型农民培训为例，实验的政策依据是，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决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新型农民的主要特征有：一是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二是思想观念不断更新；三是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四是生活宽裕；五是就业充分。与意见中的要求相比，四个实验村的村民显然还达不到新型农民的特征，为此，南农实验选择了新型农民培训作为实验的起点。培训采取的主要方式有：集中式培训、座谈式培训、事件参与式培训、项目参与式培训、外出参观式培训等；培训的主要对象有：乡镇人大代表、村民代表、农民合作组织成员、普通村民。课题组旨在希望通过一系列培训，使得农民在识别利益并经由制度化渠道

追求利益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从培训的效果上看,新型农民培训内容的选取是依据农民的实际生活需求而设置,其目的是通过政策、法规的培训,增强农民识别自身利益的能力,拓展农民公共生活空间,让农民在公共场域中相互交流意见,表达建议。与实验前相比,一方面农民的主体意识得到增强,激发了农民对其个人合法权益的重视,农民开始自觉关心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开始把个体的发展同本社区共同体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强化了农民的利益识别能力,伴随利益感的增强,农民越来越会运用民主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

其二,能力提升方略第二步:合作能力建设。

当前学界关于农民的合作能力认识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农民善分不善合;另一种是农民并不缺乏合作能力。究竟是农民善分不善合,还是农民善分也善合?徐勇教授认为,“中国农民并不是天生的‘善分不善合’,一切取决于时间、地点和条件构成的农民利益。在利益的驱动下,农民既善分也善合。我们不必低估农民的合作意愿,也不可低估农民的合作能力。低估农民的合作意愿和能力,很容易产生‘合作狂热’,以外部力量推动或强制农民合作。这种外部性的整合结果是农民一切听命于上,大大弱化农民之间的有机联系和自我整合能力。对于农民的合作,只能是‘水到渠成’,要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①

在笔者看来,人民公社体制废除以后,农民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中的利益主体,伴随竞争机制的引入,农民需要合作,需要建立合作组织来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性问题。因此,在南农实验合作能力项目实施过程中,实验始终贯穿“自治、自为”的理念,始终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以外部资源输入为契机,以表达能力建设为辅助,以农民自愿合作为基础,因地制宜地引导农民建立合作组织。在实验村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先后创造出:欧村合作社、上能西红柿协会、新农村建设理事会、养猪协会、青少年协会、文化活动中心、广育自来水理事会、村务监事会、老年协会、福育爱心社、铁场代耕农协会等合作组织。

以曾坑公路建设项目为例,曾坑村是广育村的一个自然村,有着悠久

^① 徐勇:《如何认识当今的农民、农民合作与农民组织》,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的居住历史，居住人口 300 人左右，该村距离村委会有 8 公里左右的山路。长期以来由于道路原因，曾坑村民与外界的联系相对较少，数年前该自然村集资 8 万元希望上届村委会能帮助其打通该村到行政村的水泥路，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没有实现。在上述背景下，“南农实验”选择曾坑公路建设项目作为提升农民合作能力的突破口，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一是广育村政情、社情复杂，由选举造成的派系斗争激烈，新当选的村委会干部迫切需要迅速确立起自身的权威，以便重建该村的正常秩序；二是曾坑公路久拖不决，引起了部分村民对当地政府的抱怨，群体性事件隐藏其中；三是以村庄具体的发展行动为切入点，便于进行相关的民主知识训练和参与能力的培养。

在整个曾坑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南农实验”始终贯彻着“参与式发展”的核心理念，即强调村民的主动参与，尊重村民的乡土知识。从村庄内的组织动员来看，村委会主任的意见是依靠现有村委会的组织体系，结合广育村传统上有分片治理的特点，采取党员带头示范的方式发动大家分片合作筹集资金；而村委会副主任的意见是成立一个专门的组织来完成这一资金募集任务；起初课题组也赞成由专门独立组织负责本次筹款任务，经过再三考虑和对该村实际情况的了解，课题组认为应该尊重村庄的传统、尊重大部分农民的自主选择，最终同意了村委会的集体决定。截至 2009 年年底，曾坑公路已经顺利建成。分析本次合作能力建设取得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广大村民的充分参与。实验村是以黄姓为主的宗族型村庄，该村有着共同出资修建公益事业的历史传统，村庄内修建了大量的祠堂等祭祖活动场所，一方面是为了表示对祖辈们的尊重，保持传统的祭祀活动；另一方面，通过宗族活动，普通村民每年都有数次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机会。

第二，现任村委会干部迫切需要重建权威。一方面，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希望大家尽快认可其工作；另一方面，现任村委会主任代表了林字辈家族的利益，因选举造成的族群分割已经为选举后的村庄治理埋下了隐患，现任主任迫切需要新的政绩平息华字辈家族因选举造成的不满情绪。

第三，地方政府的重视。一方面，地方政府意识到村庄内存在不稳定因素，希望通过资源配置的方式，重建地方政府与村民的信任关系；另一方面，课题组的努力也取得了当地政府的信任。

通过上述合作能力建设方案，一方面培养了村民的参与意识，农民参与村庄公益事业的能力得到提高；另一方面现任村干部民主管理能力得到了提升。在项目的组织动员阶段，课题组通过各种形式锻炼了村干部的语言表达能力、协调关系能力、果断决策能力，这使得村干部综合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此外，曾坑公路的顺利建成激发了村民的参与意识，村民懂得如何通过表达提出利益要求，如何通过相互合作维护自身利益。可以说得到挖掘后的农民的参与意识，就如同撬开了一座金矿，在曾坑公路项目的影响下，曾坑村村民经过集体议事讨论，决定自主建设本片区路灯。两个月后，当笔者随同课题组重返曾坑自然村时发现，一排排整齐漂亮的路灯呈现眼前。据村民介绍，该自然村虽然不算富裕，但所有住家户经会议协商后共筹集2万多元进行了村庄亮化工程，仅仅300人的曾坑自然村为修路集资了10万余元，为亮化工程集资了2万多元，而有些几千人的村庄却对公益事业无动于衷，巨大的反差显示出自主参与的重要性。

反思新农村建设，展望未来的道路，我们的选择只有一条，那就是依靠农民，尊重农民，始终坚持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曾坑村村民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很快辐射到广育其他几个自然村，在南农实验课题组的鼓励下，截至2009年1月份，整个广育村已经全部实现了灯光亮化，该工程不仅没用国家一分钱，而且维持其运行的电力成本问题也在村民的协商参与下得到解决。从曾坑村村民的集体参与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以村民自治为标志的基层民主政治实践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日益多样化的民间组织的发展为农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空间。

四 经验及反思：对南农实验的进一步讨论

任何一场社会实验都会因其设计理念、操作步骤、实验环境等产生出不同的实验结果，如何客观认识、评价实验的结果是衡量实验取得成功与否的重要原则。“南农实验”是一项在探索农民民主能力提升方面较为成功的实验，在此过程中，农民的表达、合作、监督等方面的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南农实验”也是一项有待进一步改进的实验，本部分关于“南农实验”的几点讨论或许能为未来的相关村治实验提供一些参考。

第一，中国农民不缺少利益表达所需要的政治环境，但利益表达制度